

DISCUSSION ON HISTORY OF T.C.M. CONCEPTS

*Knowledge of the Human body Deduced
From the Knowledge of the Universe*

探寻思想轨迹丛书之七

言天驗人：

● 中医学概念史要论 ●

图娅 著

中医学形成的特点，受时代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所制约。

中医学概念的产生不是实证发现的结果，而是文化哲学的结晶。文化哲学的特质，又总是集中反映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之中，因则思维方式怎样，藉以建立的学说特点便会怎样。

中医学理论概念，不仅具有医学性质，而且更具有文化哲学涵义。

剥开中医学概念、理论的文化哲学外壳，还原其朴素的医学内核，然后才能将其置于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整理提高，发展更新。这很可能就是中医学在现代科学群发展中的必经之路。

中医学源于特殊的文化母体，是古代中国伦理道德和政为哲学概括的结果；中医药学的文化哲学内涵，天人观的总画面，阴阳五行的是与非，气一元化的本体论规定与认识论特征；中医学理论的逻辑学特征是以经验技术为依托的意向概念，直觉判断而非比推理。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容提要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而概念则是思维活动的基本形式。民族的思维历程和学科的理论发展,无不通过其概念体系的建构而表达出来。因此,本书选取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几个概念,采用历史溯源的方法去探寻它们发端形成的古老源头;考察它们与所表现事物现象间的距离及趋近程度;追索它们与中华民族文化哲学传统思维方式的相互关联;比较它们与外域文明的某些类同及差异。力图通过比较准确完整的史料史实研究,理清中医学概念体系独特的文化气质,并探究揭示这种特殊气质的形成因素、现实影响及其魅力所在。

序

八十年代在中医学术界，兴起一派新的观点，它对传统的中医学概念和理论体系，作了历史地哲学地文化学研究，基本结论是：中医学形成的特点，是受时代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所制约的。古人认为一统天下归于气，人体生命是气的特定运动形式，生病就是气血失常，治病就是调理气血。所以说，中医学概念的产生，主要不是实证发现的结果，而是文化哲学的结晶。文化哲学的特质，又总是集中反映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之中（如取类比象等），因则思维方式怎样，藉以建立的学说特点便会怎样。比如秦汉时代（公元前数百年）权威思想是“天人合一”，因而“天人相应”自然构成该时代出现的《黄帝内经》的思想基础；魏晋（三世纪）以后玄学“得意忘象”思维方式的发展，导致医学概念更加走向虚化；宋时（十世纪开始）理学的历史作用，使后世医书大都“参以太极之理”；而两千年来的经学思想，更阻碍了医学体系的更新。这都说明，中医学理论概念，不仅具有医学性质，而且更具有文化哲学涵义。因此，中西医学二百年来“汇而不通”、“结而未合”是很自然的。就是说，中国传统医学与现代科学之间，有个重复环节，不能逾越。即：只有不是把古老的中医学与现代医学简单的对号比较，而是对中医理论进行文化哲学的历史解析，亦即首先剥开中医学概念、理论的文化哲学外壳，还原其朴素的医学内核，然后才能将其置于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整理提高，发展更新。这很可能是中医学在现代科学群发展中的必经之路。

图娅博士，内蒙古人氏，精于中医学专业，又具文史诸科广泛学识，天资聪敏，富有创见，所著《言天验人》一书，是代表了该文化哲学医史学派的又一力作。该书从经验技术层面和精神

文化层面概括了中医学这一特殊医学模式；具体指出了，历史上中医学有与中国哲学共用的概念范畴，也有自身专用的概念范畴，而后者又受前者所制约；着重分析了中医学源于特殊的文化母体，是古代中国伦理道德和政治哲学模塑的结果；概括了中医药学的文化哲学内涵：天人观的总画面、阴阳五行的是与非、气一元化的本体论规定与认识论特征；具体指出中医理论的逻辑学特征是以经验技术为依托的意向概念、直觉判断和类比推理，因而既有合理内容又有自身局限。

总之，该书启迪了人们对待传统医学如同对待任何传统文化一样，要采取历史地分析态度，任何国粹主义和虚无主义都是不可取的。除了民主与科学而外，不会有任何发展更新中医药学从而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其它途径。

中医药学服务于约四分之一人类两千余年，今天再次初露发展的曙光，欣逢《言天验人》一书出版，谨为之序。

车离

1997年6月4日于哈尔滨

目 录

序	车离 (1)
卷首语	(1)
引言	(1)
上篇：中医学概念史	(8)
第一章：阴阳	(8)
第二章：五行	(33)
第三章：气	(56)
第四章：脏腑（藏象）	(78)
第五章：经络	(101)
第六章：血、精、神、津液	(118)
下篇：中医学概念要论	(129)
第一章：理解与表达	(129)
第二章：在表象的背后	(140)
结束语	(150)
专家评语	(152)
附篇	(158)
一、医经注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158)
二、“道器观”、“意象论”与中医学理论 的超形态特质	(180)
三、中医传统教育的历史思考	(206)
四、中医学：昨天、今天、明天	(252)
后 记	(270)

卷 首 语

中国文化善于并且习惯于从关系中把握认识对象。他们认为在一切关系中，“天”、“人”关系无疑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人的原则规定了天，天的原则影响了人，所谓“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不了解这一点，将很难理解中国文化及中医学体系的本质特征。因而，我选择了这样的题目：

言天验人：中医学概念史要论

引 言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而历史学只是认识现实的一种努力。因为“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过去是构成现实的必然成分，而现实中又蕴育着将来的种种可能性。所以，两千年前，伟大的司马迁就朴素而深刻地论述了史学的功能意义：“述往事，思来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只有把握住了史学的本质意义，人们才会从历史的尘封中触摸到时代的脉搏；也只有摒除了急功近利的短见，人们才能从现实社会中寻索再现历史的真实。

—

人为万物之灵，思维着的大脑是人与动物的最终分界。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而概念则是思维活动的基本形式。人类早在幼年时期就产生了原始阶段用符号或者有声语言表述的概念。思维的成长和演化本身就是概念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运动，是人类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追求。因而在理性思维的领地，“概念”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理解就是用概念的形式表达”。

我们不能离开概念去直观，也不能离开现象去思维，康德早就说过：概念无直观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概念是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它力图表达的是最趋近客观事物的特有属性、本质、全体及内在规律真面貌的简约说明。基于这一艰巨的使命，概念问题内部浓缩隐涵着它与生俱来的、亘古常新的探究价值。

概念是思维的起点与细胞，又是认识经验的总结与传递，概念所表述和储备的是人类认识和实践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关于认识对象的全部知识，一个重要概念的形成及其内涵的些微变动，几乎都要经历几百年的历程。因而，概念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人类认识史、思维发展史。

概念所反映的事物本质在某一具体时空中是相对的、渐变的，它与人的认识一样没有绝对终极；

概念是生动而非僵化的，它不仅固定，而且流动，因为它所反映的世界本身就是“一团永恒的活火”；

概念标志着主观与客观的对立统一；

概念反映了思维的被动性与主动性的辩证关系；

概念水平显示着对客观世界及人类认识能力的表达深度及程度；

概念还应代表着普遍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灵活与确定性的和谐统一。黑格尔有句名言：没有抽象的真理。反映事物现象同一性基础上抽象出来的概念必须上升为“丰满的具体”，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把握住某些相对真理而不是去追逐一些幻想。

以上，就是在当今时空中，我们对“概念”这一概念的界定和对其“理想状态”的追求。

二

一个民族的思维发展过程，可以浓缩为一部对宇宙对自身认识的概念史。中国古代语词中没有“概念”、“范畴”，但是对于概

念的意义和作用、概念能否正确表述事物和准确传递、运用等这些问题，中国先哲们在很早就开始了思索和探究。先秦“名实之辩”，魏晋“言意之辩”和历代都不曾忽略的“正名”，都包含着对概念反映客观事物关系的哲学思考。《释名》言：“名，明也，名实事使分明。”

提到“名”，我们最容易想到孔子的格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虽然他所急于正之“名”是社会政治伦理之名，正世子之名，严格遵守名分“不逾矩”。但也提出了“名之者必可言也，言之者必可行也”这一探讨概念与事实之间联系（相统一）的哲学命题。我国古代的社会背景，使人们认为合理的政治伦理生活是名实相当的具体表现，因而早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之际，就形成了“正名治国”的一贯传统。《尚书》讲“取类正名”，《周礼》讲“正名百物，明民共才”，有着一套完整的“制义、出礼、体政、正名”程序。由于对政治伦理生活和认识身外世界的不同热衷，又分为正名分——维护伦理规范的逻辑表现，如孔子、孟子、董仲舒等，“名号以达天意”，巩固封建等级制度；正名实（形名）——确定名的内涵外延及其与事物的关联区别。如《老子》言：名可名，非常名。王弼解释为：“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可以理解为认识到概念的相对性。《庄子》讲：“名，实之宾也”（〈逍遥游〉）、“名正于实，义设于适”（〈至乐〉）肯定了名由实来确定。《管子》亦言“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名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以形务名，督言正名……执其名，务其应所以成，此应之道也……以其形、因为之名，此因之术也”（〈心术〉）。“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圆墨白之实。名而无形，不可不寻名以检其差。故亦有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也”（〈大道〉）。“修名而笃实，按实而定名，名实相生，反相为情，名实当则治，不当

则乱，名生于实，实生于德，德生于理，理生于智，智生于当”（《九守》）。

墨子提出“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经上》）。而荀子更提出了概念发展运动的观念：“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正名》）。”公孙龙子等则更深刻地看到了概念表述客观实在过程中的矛盾问题。

可见，古代哲人在争论“名”究竟能否符“实”时，已经看到名实之间渐近但永不重合的本质特征：

《庄子·秋水》讲：“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缘者物之精也”；“言不尽意”的深奥的命题已经提出；

唐代韩愈倡导“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认识到概念的发展变动；

从墨子时代到唐宋，人们一直在探究着概念的逻辑分类问题，如：达名、类名、私名（墨子）；共名、别名（荀子）；定名、虚位（韩愈）；等等。

而坚持“名号以达天意”的正名论者董仲舒，则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教训：概念的形成及运用中应该避免哪些“误区”。

总之，古今中外，哲人们在用探究的目光注视世界的同时，也以这种目光审视人类自身的思维能力及其表达。对“概念”理想状态的追求与概念实际水准的相互矛盾，将永远贯穿于人类认识世界的无止境追求中，而人类社会也将在这种追求中不断进步。

三

一门具体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同样也可以通过其概念体系的建构和演变表达出来。每门科学都必有某些基本概念来做为它构建理论的前提，因此这些基本概念中凝聚着该学科的历史形态变化和特殊气质风格。

“既然文化上的区别一般地是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则哲学

上的区别更是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①。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基本概念，最深刻地反映了中医学与西医学和其它一切医学在思想范畴上的区别，又最生动地揭示了它与中国哲学在思想范畴方面的血缘关系。本书试图选取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几个最基本的概念，寻索它们形成、演变的历史脉络；分析它们形成的文化哲学背景及其与哲学概念范畴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考察它们与所表述的事物现象实质之间的距离及趋近程度，比较它们与外域医学概念的类同与差异所在，力图通过较为确切、全面的史料史实研究引证，清理一下中医学基本概念的来龙去脉，并在比较可靠的结果上讨论一下中医学基本概念、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特殊气质。

本书选择了两个层次上的基本概念：

一、哲理、医理共同拥有的概念：天人、阴阳、五行、气、形神、精；

二、中医体系独有的概念：藏象（脏腑）、经络、血、津液……

由于汉字的母体是原始记事的图形符号、刻划记号，造字规则基本坚持了表形、表意、表音三种原则方法，因此汉字独特的表意性质使它成为日益复杂的、特殊的符号系统。汉字的这种特殊性给民族思维形式以不可忽略的影响，“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语言特殊性对概念的构建表述势必也有相应的渗透，并且概念必须由语词表达。如前所述，汉字的多歧、灵活、弹性、模糊，直接造成了概念理解上的多歧模糊，枝蔓横生。加之，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反复使用的概念往往是在不加界定的前提下使用的，理解它则势必造成极大的随机性；主体认知水平的差别导致对同一概念语辞的理解大相径庭，对于同一概念不同层次的理解见仁见智，往往论争双方因对概念理解不同而相互误解，无的放矢，给概念源流的清理和理论体系的理顺造成了新的障碍。从人类的心

^① 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家》第一卷 18—19 世纪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 年版，第 431 页。

理而言，语言的模糊性也正是词语得以引申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中国，意会与言传的微妙关系不能不说是结合了双方面的因素——人类心理和汉语特性。所以，中国哲学与中医体系中许多词语所表达的概念内涵无限引申，外延没有精确边缘，给我们的考察带来许多困难——这种困难本身也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之一。

同时，还要考虑到古人思维方式与我们的可能存在着的差异性，避免曲解史料史实而把今天的认识强加于古人，力求准确地运用分析史料是保证立论科学的前提。摒除“六经注我”式的大义微言和断章取义的实用主义态度，才能准确把握概念的内涵及外延。

医学面对人类的健康与疾病，它必须从理论与临症两个层面来进行研究，而这二者之间关系的把握是困难而又至关重要的；医学又面对人的个体差异，因而它不能完全像数理学科那样研究标准化的理想对象，也不能像哲学那样高度、本质的抽象，医学概念更需要辩证地把握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和确定性与灵活性的关系。所以，医学科学是一种“殊象科学”，医学概念更应该上升到“丰满的具体”层次。

《淮南子·齐俗训》讲：“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谓是与非各异、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观之，事有合于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于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其道理也，求合于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于心者也。忤于我未必不合于人；合于我未必不非于俗也。至是之是，无非，至非之非，无是，此真是非也。”

哲学从来就不是简单的诠释，而是批判的、分析的、辩证的。构成哲学论述本质的是它的不断批判性，批判的辩证法正是它的生命线。

科学是一种使其一切经受检验和批判性的、非教条性的事业。

避免“自是非人”的认识误区，努力坚持辩证的、非教条性的哲学和科学原则，是本书作者的研究宗旨。

上篇 中医学概念史

源远流长的中医学体系，通过她独特的概念系列的起源、形成和相互关系的变化而表达出来。从它滥觞的古老源头到今天方兴未艾的勃勃生机，概念的历史引导着我们去探索、去把握中医学的昨天、今天与未来。

第一章 阴 阳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

《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阴阳，是中国哲学重要而独特的概念（范畴），也是中医学理论基本的重要概念。哲理阴阳与医理阴阳的异与同，合与分，反映了中医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复杂联系；哲理阴阳与医理阴阳的相互渗透、促进和制约，反映了哲学理论与具体学科理论的辩证关系。

一

阴阳之本意，大约起源于对日光的直观描述。《说文解字》中作“𡇗”、“𡇗”、“𡇗”为云覆日光；“𡇗”为日出地面；而“𡇗”则为水南山北，为“阨”，“𡇗”为水北山南日照充足之所，这里已将日光与山川相互联系。甲骨文中有大量“阳日”、“不阳日”、“晦日”等记载。《伯子翼铭》中有“寔伯子寔文，作其征𡇗，其阴其阳，以征以行”。《诗经》、《易经》、《尚书》、

《仪礼》等都在这种意义上使用“阴阳”。

《诗经》：

“其阴，虺虺其雷”（〈卫风·经风〉）

“习习谷风，以阴以雨”（〈卫风·谷风〉）

“既景乃岗，相其阴阳”（〈大雅·公刘〉）。

《尚书》：

“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山之阳，至于衡山”（〈禹贡〉）；

“惟天阴鹭下民”（〈洪范〉）。

《易经》：

“鹤鸣在阴，其子和之”（〈中孚·九二〉）

此后，对于“两极对立”这种古老而普遍的现象的直觉捕捉和表述，人们广泛使用着上下、进退、动静、消息、牝牡、雌雄、阴阳、柔刚、盈虚、翕闭、善恶等等语词，试图表征感知到的自身状态和外部世界中普遍存在着的对立现象。这种状态又持续了漫长的过程，先秦诸子百家著述中有大量记载，此时期“阴阳”尚未上升到高于其它语词概念的层次。

赋予“阴阳”以普遍性和抽象性意义并做为天地之间的两种有代表性的、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为用的概念，首见于《国语·周语》。公元前780年伯阳父说：“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之乱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

“阴阳”概念由此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国语》中有许多类似论述：

“阴阳分布，震雷出滞”。“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周语上〉）；

“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用而还，月盈而匡”（〈越语下〉）。

作为天地万事万物对立统一现象的概括结果，“阴阳”无疑较之其它语词更加具有涵盖力。阴阳古义中可引申出升降、上下、冷暖、明暗、进退、凸凹、遮掩与暴露、柔弱与强健等涵义。语词的模糊性越大，概括性越强。例如，内外、冷暖、上下之间的相互涵盖，从字义上讲就不能包容那么广泛，只有阴阳具备了作为代表天地间对立属性概念的内蕴。因为，在人类生活中，没有什么事物能比日月交替更加直观和无所不及的影响。无论“远取诸物”，或是“近取诸身”，阴阳灵活的内蕴和没有明确边缘的外延，都可以满足人们以之说明世界及自身的需要。一位人类学者说：不是女性给大地塑造了丰产的形象，而是大地给母亲们做出了丰产的榜样。这种认识顺序不无可取之处。

于是，“阴阳”概念开始进入鼎盛期，从自然到人事，无不用之进行论证阐发。仅举《左传》几例：“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鹖退飞过宋都，风也……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僖公十六年》）；“天有六气，淫生六疾。六气曰：风雨阴阳晦明也”（《昭公元年》）；“春，无水，梓慎曰：今兹宋郑其灾乎！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以有时灾，阴不堪阳”（《襄公二十八年》）；“（日食）公问梓慎曰：是何物也？祸福何为？对曰：……阳不克也，故常为水”（《鲁昭公二十四年》）；“（日食）梓慎曰：将水，昭子曰：旱也，日过分而阳犹不克，克必甚，能无旱乎？（同上）。 ”

可见，这时的“阴阳”概念和“阴阳之事”还没有掺入人君意志的成分，是一种对“天地之气”——自然界中某种内在的规律性的初级认识，尽管它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却没有混淆自然现象与人事吉凶最后界限；同样，这时的“阴阳”是笼统而泛化的，它们的属性已经有了某些限定，阴阳内涵各不相同，是不可互相变换的。它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未必有助于人们从实证的角度去探究，却能启发人们思辩的灵感，所以，科学与哲学的不同价值观对它们必然做出不同的评价。

《老子》一书，将阴阳赋予更高的哲学含义，视其为超出“天地之气”的、宇宙间的普遍属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淮南子·天文训》解释道：“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为阴阳，阴阳合而万物生”。具有宇宙生成论的意义。《庄子》认为：“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则阳〉）。“阴阳错行则天地大絪”（〈外物〉）。“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大宗师〉）。“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天道〉）。所以，人与宇宙一样，都有阴阳，人应该返归于自然之阴阳，不得以喜怒动于心，使“阴阳之气有沴”。而“古之人在混茫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谓至一”（〈缮性〉）。道家崇尚的“自然”，是处于混沌之中的无知无识，无为无欲，非阴非阳，亦阴亦阳的朦胧状态。《管子》讲：“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乘马〉）。“日掌阳，月掌阴，星掌和，阳为德，阴为刑，和为事”（〈四时〉）。并强调“人主者立于阴，阴者静，故曰动则失位。阴则能制阳矣，静则能制动矣”（〈心术下〉）。这时仍未建立那种“阳为君，阴为臣”、“阳尊阴卑”的概念。

先秦唯一明确提出“天人相分”的荀子站在“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天能生物而不能辨物，地能载人而不能治人，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而后分也（〈礼记〉）”的认识基点上，以阴阳说明异常自然现象与人世治乱“不相通”，并无必然联系：“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夫星之坠、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天论》）。这在哲学层面而言，具有振聋发聩般的意义，体现出中华文明最突出的传统：睿智的哲人思考和天才地直觉猜测；然而与《左传》等书一样，将自然变化归结为“阴阳接”的认识终

端，又是无助于具体科学的展开的，因而最终也为科学的哲学思想萌生了隐患。《吕氏春秋》以阴阳作为其宇宙生成论的环节之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仲夏纪·大乐》）。《淮南子·本经训》解释为：“太一者，牢笼天地，弹压山川，含吐阴阳，伸曳四时，纪纲八极，经纬六合。”这种“太一”的性质，显然与“道”、“玄”有着同样的复杂性、含混性。笔者以为，就其认识论根源而言，与其说古人热衷于确认宇宙生成本体的“物质”或“精神”属性，不如更贴切地说他们醉心于论证天地万物的“一脉相通”性。无论具有“唯心”“唯物”观点的中国哲人，都无法超越这种历史所限定的固有层次。而“阴阳”则是他们共同选择的、沟通宇宙万物的纽带。在“天人同构”、“天人相通”的感觉状态中，“阴阳”成为宇宙万物统一体中的“经络系统”。

系统而明确地将“阴阳”作为哲学概念范畴，表征宇宙中两种对立力量及属性的著述当属《易传》。《周礼·春官》记载：“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在“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的上古诸多占卜方法中，唯有《周易》得以流传，并与来自齐、燕滨海文化的“阴阳”相融合，形成我国文化哲学及各个领域中最有影响的政治哲学专著。这与《周易》的内在条件直接关联：一、《周易》是周人占卜记载，以乾为首，以乾为尊，符合父系宗法社会要求，与传说中重艮之《连山》、重坤之《归藏》相异；二、本身具备两重性，既有丰富的辩证观念，又有神秘主义色彩，其合理性、臆测性及诡辩性，易于后人随意发挥；三、由“一”爻和、“一一”爻构成的卦爻体系与阴阳二分法，有本质上的相通点；四、相传《易经》为伏羲、文王所制，也满足了时人崇古贱今，附会圣贤的一贯心理。《易传》中讲：“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谓之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